

從維生德斯坦桐案看澳門葡中精英聯盟

David Tomás Afonso*

鴉片戰爭期間（1839-1842），中國和大不列顛國這兩個交戰大國讓澳門經歷了多次危機。本人想藉此拙文對其中一個危機時刻以及這一危機導致了在澳門周圍的軍事干預進行分析。我們將看到一個英國人被綁票可能會導致澳門界限以及司法管轄權的所有問題。

1840年，英國艦船實施了海上封鎖，這一行動使得中國派士兵往澳門，拘捕英國臣民。英國人在封鎖海域期間，扣押了多艘載着貨物的中國商船，以此激怒廣東總督林則徐。林則徐見此下令懸賞捉拿全部英軍軍官以示還擊。由於中國人難以直接接觸到英軍軍官，林的這一指令沒能奏效，於是，中國當局下令捉拿英國平民。

證實發生了三起案子，第一個案子發生在1840年6月，當時有兩個傳教士被當做英國商人遭到華人的襲擊；第二個案子是華人企圖在澳門抓一名美國人時，用刀攻擊了兩名英國軍官。這些受害者都逃過劫難，沒有被弄死。第三起案子發生於同年八月五日，這樁案子更具代表性。事情是這樣的：在一商人家當監護人的維生德·斯坦桐（Vicente Stanton）早上出門去澳門灣游水時被人綁票了。

讓人覺得安全的澳門，在八艘中國船隻在港口靠岸時才作出了反應。根據W.Travis Hanes和Frank Sanello說¹，澳門總督處理此事時顯得頗有洞察力。不過，他沒有採取任何主動措施。首先，我們不同意作者的這一說法，因為當時對維生德·斯坦桐的失蹤有兩種說法。維生德·斯坦桐失蹤的第二天就流傳着這兩種猜測。一種猜測說，是某些想

* 碩士。

1. W.Travis Hanes、Frank Sanello：“鴉片戰爭”，Naperville:Sourcebook，2002年，第10頁。

得到廣東總督許下的酬金而綁架了他。²另一種說法是，這位英國臣民溺水身亡。

澳門總督馬上通告說，他委派檢察長對失蹤案進行調查，即使辦案需要錢也在所不辭。同時，澳門總督又說，他那天才確知中國官方對此尚不知情，再說，此案必有中國官方的合謀參與。

翌日下午二點，檢察長與道台開會，告知對方說，如果這是中國當局所為，這將給澳門帶來有害的後果。道台保證說，如果是中方所為，他本人肯定知曉。

他非常懷疑有華人捲入綁票案。失蹤案發生兩天後，英國當局發出正式通告給澳門總督，並要求回話。因此，鑒於對此案有兩種猜測，中國官員又兩次保證他們不知情，我們可以問澳葡當局是否有時間在這短期內調查清楚事實真相。這不靠譜。澳門總督回覆了英方八號提出的指控，如回文所見，英國高級議員說了，當時港口停泊着幾艘戰艦，半島也進行了多項軍事行動，這一切讓人相信斯坦桐是被華人綁票了。對澳門總督的回覆進行分析後，我們看到，按照斯爾唯亞，平托（*Silveira Pinto*）的說法，斯坦桐是在澳門灣溺水而死的。

“從猜測中永遠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而他本人拿不出任何證明來證實斯坦桐被華人帶走了。³澳門總督最後說，這事不可能是華人幹的，因為中國官員不知情，再說了，沒有他們的許可，不會出任何事。關於中國帆船的停靠，澳門總督說，中國帆船在澳門港停靠司空見慣，三百多年來都是如此。最後，談到澳門的安全時，澳門總督接着說，澳門當局不可能對在澳門發生的事全都負責。到了十號，各種疑惑和新的謠言滿城皆是。此外，還有一封信。到處在說，斯坦桐被綁到廣州去了。而英國學者再次發文誤導讀者，說澳門總督早已派當地的一個華人去見林。⁴澳門派去覲見林的不是當地的一個平民百姓，而是道台大人，一個在澳門管治華人手握軍權和行政權的中國官員。不是

2. 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2頁。

3. 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2頁。

4. W.Travis Hanes、Frank Sanello：《鴉片戰爭》，Naperville:Sourcebook，2002年，第107頁。

像Hanes e Sanello認為的一名普通市民，而是一個擁有實權的管理要員，是葡中在外交對弈中的一枚重要棋子。彼得沃特法（Peter Ward Fay⁵）說，澳門總督可能採取了一點措施，因為他承認道台啟程去了廣州，而且這個道台不是澳門當地人。澳門總督也肯定地說，如果有必要，他親自要求中方表態。就在這一天，澳門總督得到斯密斯艦長這樣的口頭威脅：如果告訴他說，斯坦桐回不來了，他將兩艘大不列顛戰船駛入內港抓捕中國官員。

澳門總督分析此事後說記不起答覆了，而這位英國艦長如果把陸下的旗子踩在腳的話⁶，犯的罪行也就是如此。澳門總督要求英國艦長以書面形式送達這個通告，這樣的話，當他真採取軍事行動時，所有文明國家都能知曉此事。與此同時，澳門總督向查理義律提交來了正式書面投訴。這份投訴表明了澳門總督的堅定立場，旨在盡全力保持嚴格的中立，不讓澳門脫離葡國人的管轄。8月11日，澳門檢察長書面投訴中國當局，指責他們隱瞞事實，要對因華人綁架英國臣民案導致個人蒙受的全部損失負責。此外，還要求中方把斯坦桐交給澳葡當局，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澳門不受英國干預。就在同一天，議會和諮詢委員會開了會，得出如下結論：沒有辦法保衛澳門，抵禦英國入侵。由此，建議總會採取措施應對局面。

而會議記錄不僅說葡方相信澳門不會因那位英國艦長的威脅而受到攻擊，而且，再次強調說澳門無法抵抗。最後，會議記錄說，顯而易見，英國攻打澳門在國際舞臺上將不受歡迎。人們也注意到，儘管局勢嚴峻，但澳門的精英們相信澳門將採取各種辦法，通過在衝突中與英國人和中國人建立的外交關係，可保澳門平安。

英國代表在回覆中保證說，那個軍官說的話只表明要保護英皇室的臣民，他不會攻打澳門。同日，澳門總督知會莊士頓說，澳門檢察長與道台三次會晤，而這位道台三次說不知曉斯坦桐被綁架的事。澳門總督還說，道台此次去廣州會有結果，因為他帶着葡方對中方過分行為的投訴和抗議，並希望那位英國臣民安全歸來，或者希望一個

5. Peter Ward Fay：《鴉片戰爭》，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1975年，第246頁。

6. 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18頁。

“平安的將來”。⁷然而，道台返回澳門時，帶來了好多兵，澳門再次恐慌不安。道台十二號啟程去了廣州。這天他給林則徐發了公函，說他啟程赴廣州。但得到林不讓他去廣州返回澳門的旨意。可是，道台決議去廣州。道台這公函讓我相信葡中雙方的精英有了聯盟，確保英國臣民返回。與此同此，英軍加緊了海上封鎖，有些中國官員知道英軍的實力，有些不信英軍比他們強大，因此，中葡雙方在外交談判中經常交談此事。葡方最終成功地舒緩了中國地方官員中的精英對在澳門未造成動亂的洋人持有的好戰姿態。最後，道台直接抗了林大人的旨意。

在等級“森嚴”的社會裡，一個道台不聽朝廷的封疆大員的指令，這表明這位元道台大人把葡方的事真當回事了。道台到了廣州，向林大人遞上葡方請求，懇求林大人放了斯坦桐。林大人因道台求情放一個洋人而痛斥了這位道台，再說道台沒有這個權利，因為這個洋人不是在澳門抓的，而是在割狗環灣抓的，因此，澳葡對此無權投訴。林總督派了約兩千士兵聽從道台指揮，命令他回澳門，見到英國人就抓。會議結束時，告訴澳門檢察長說，他與將軍們一起去查驗，把士兵安置在離澳門最遠的營地，還請求澳門檢察長“會知英國人，說他不但不執行林總督抓英國的旨意，也不同意軍人這樣做，但是，英國人行事必需更加小心”。⁸這一態度既表明道台已經與葡國精英們聯合起來了，也說明了道台大人真正瞭解英軍的實力，不同於林大人，所以才抗命不遵。這樣，得出的結論是，澳葡和道台都害怕英國人，而道台支持了澳葡精英保持中立。8月19日，諮詢委員會會議記錄了關關口的戰事，說英軍兩艘戰艦向駐守在關外的中國士兵開了火，也就是說在葡管轄範圍外。接着，12或13艘英軍戰艦上的軍人登陸，徹底打敗中國軍隊。此時發生的事讓人捉摸不透，澳門總督見此召集軍事會議，立刻召集民眾，告訴他們發生的事，給聖奧斯定軍營（Quartel de Santo Agostinho）官兵發放武器彈藥。與此同時，澳門檢察長知會了道台說，英軍攻擊的原因是中國軍的駐紮地就在澳

7. 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26頁。

8. Barros：“第14次與諮詢委員開會的會議記錄影本”，第327頁。

門邊上；再說，澳葡多此次跟中國官員說過不要把軍人安置在離澳門那麼近的地方。“日後還要來中國軍隊，定要考慮到將給葡人和華人帶來嚴重損失的其他類似攻擊。”⁹有關此事，根據W.Travis Hanes e Frank Sanello所說，一方面，英國人因葡國人做調解人而感到羞恥，另一方面，他們攻擊中國軍隊，摧毀中國戰船以及佈置在關閘口的大炮。這些寫東西的人如同以往一樣犯了錯誤，第一，他們說戰事發生在割狗環灣，而實際發生在關閘口前；第二，他們說海戰救了澳門，事實上澳門當時沒有危險。

在發生斯坦桐綁票這段時間內，應提出並弄清楚這個問題：他人是否確實在葡管轄的澳門。道台大人在與澳門檢察長的一次會晤中說，斯坦桐是在割狗環灣被華人綁票了。因此，斯坦桐不在澳門管轄的地方，也不在道台治理的地方，也不在縣衙管制的地方，而是在“虎口”官衙管治的地方。關於管轄問題，馬上就可看到，林大人認為澳葡管轄地到瘋堂裡城門為止（這完全不對），不包括瘋堂裡村（大部份是華人），如同割狗環，那裡有個漁碼頭。這一切讓人相信斯坦桐很有可能被那個村的漁民綁票了。至於管轄問題，應指出，中國文獻，包括林大人給皇帝的奏摺和陳條，清楚地表明明朝允許蠻夷客居澳門，顯示華人把澳門當做他們的領土。再看中國的告示中多次把蠻夷稱作“順從的洋良民”，最後，有關澳門管轄的界線以及其釋義，應指出的是，1839年9月3日林則徐親臨澳門，葡方決定在關閘口迎接，而不在瘋堂裡城門口。這意味着，在澳葡看來，其管轄的地方界線正是關閘口。

若瑟·宮策松·阿豐素（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在談到澳門時說，那時，對澳葡來說，澳門城市發展，就文化傳統而言，是自發性的，城市面向南灣，不過澳門的城市擴展得獲中國官方的批准。可是，澳葡不理會中方的批准或不批准，千方百計繞着走，其城建與華人居住的街道與內港成直角的城市不同。若瑟定了兩個分析參數：第一個行政管理邊界，另一個是文化邊界。關於行政管理邊界，若瑟引

9. Barros：“1840年8月29日記錄副本”，第331頁。

人注意澳門行政管理界線從來沒有訂定過也未被中國人確定過。所以，是隨中國軍事干預而變動的。這在葡方文獻中可得到佐證。¹⁰

事實上，如果葡當局認為它的管轄地的界線在瘋堂裡與關閘口之間的話，林總督不會再次重申說，從行政角度看，割狗灣是天朝帝國的，而澳門不外乎只是一塊租地。正因為這一不確定的定義，澳門一直擔心中國實施封鎖，一旦封鎖，澳門沒吃的沒喝的，任憑華人擺佈。除外，事事變得更加複雜，城牆內的城市被分割成兩塊，一塊朝向內港，住居的主要是華人，他們一致聽從中國政府；另一塊朝向外港，居住的主要是葡國人，他們聽從葡當局。

最後，不要遺忘一些文化性的問題，也干預了管轄界線之事。就此，我將更具體地講講墓地的事。眾所周知，祭拜祖宗是儒家的根本之一。當時的澳門，在瘋堂裡和關閘之間有多處墓地，中方官員不但明文禁止墓地內搞建築或植樹，而且把它們納入了中國行政管理屬地。

結論：我們肯定地說，澳門曾經是在葡國管治下的中國領土，一直與中國當局合作，而中國當局不但控制澳門的人口，而且對澳門提供物質。但是，由於澳門管治界線不明確，行政管理非常模糊不清。儘管中國當局把從瘋堂裡到關閘之間的地方租給了葡人，但幾乎沒有確定界線。從瘋堂裡到關閘之間的地方，以及氹仔島、路環島和青洲島都屬於中國，但實際上沒有行使過管理，所以澳葡當局把握不定，疑惑多多，尤其是後來的亞馬留總督。這位澳門總督下令拆掉城牆並非偶然，他的目的是強化葡人的立場，也就是說，澳葡管轄的範圍是從澳門半島一端到關閘口。

10. José da Conceição Afonso, 澳門：“戰略及衛生城市規劃試驗（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文化雜誌》第38-39期，1999年1月至7月，第221-247頁。